

構連經驗

倘若你喜歡的話，你可以說：生活只不過是經驗的另一種說法，但是我們卻必須為它找到一個適當的字眼(Williams, 1979: 168)。

在前章裡，我們曾提及「經驗」在文化研究早期發展中的重要性。在開始簡述文化研究的研究計畫時，本章認為，研究實踐即界定出何謂文化研究(而本章是整本書大多數論點中的一部份)。因此，「經驗」在文化研究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被視為是研究計畫本身以及個人或集體研究者的「傳記」中，所處理的議題；更確切而言，文化研究可以被視為是來自於受訪者的「資料」中所處理的議題。現在，我希望能夠更透徹地檢視這個概念，以及使用這個概念的可能方法，因為可以提供我們研究潛在的助益。就像所有可能引起誤解的簡單概念，「經驗」這個概念也具有高度的爭議性。經驗的概念與淺顯易懂、簡單以及本真性等概念相關，也與民主精神有關。就像所有的概念一樣，經驗的概念也充滿爭議，而且對於「經驗」及其地位的理解，也隨著文化研究的發展而不斷地產生改變。跟隨著普洛賓(Probyn)的觀點，我的目標在於：闡釋經驗是

一個實用的政治性與批判性範疇，而非僅是與本真性或「常識與意識形態」等概念相關的類目。甚至，我同意於普洛賓所堅持的觀點，她認為：經驗是一個重要的知識論範疇，而且經驗可以被當成是一種「認識的方法」，意即同時認識我們自己以及認識其他「存在方式」的方法。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為「經驗」的概念提出理論。理論時常被視為是艱澀難懂、抽象以及某種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必須克服的難題。在此，我想對理論(Theory, 以大寫 T 來表示)與理論化(theorising)之間做出一個區分，這是一種研究實踐，同時也是一項好的研究的一部份。為了要理論化經驗，「構連」(articulation)將是一個相當實用的概念。經驗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論述性的「構連場域」(site of articulation)，透過此種構連場域，主體性與認同的概念得以被形塑與建構。這與我們如何將自己定位於這個世界中的方法有關，也與我們如何反身性地發現我們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有關。因此，經驗並非我們生存的真正及原始起源，相反地，經驗僅是我們生存過程中的一部份，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構連出認同的意義。

我希望透過舉例的方式來說明，尤其是以霍爾(Stuart Hall)的例子為主；更確切而言，我將以霍爾的雙重自我為例。亦即，身為一個作者與文化理論學者的霍爾，以及身為一個具有多重身分認同，並在他的生命中經驗到特殊事件的霍爾。霍爾在諸多文章與訪談中，透露出這種「雙重身分」。他在一篇名為「最少的自我」(Minimal Selves)(Hall, 1987)一文中，霍爾曾以「形容詞的註釋」(adjectival notes)提及他的「背景」：生長於牙買加、他的家人以及他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他家鄉的社會文化脈絡，以及他如何離開那裡並成為一個英國移民者。關於他自己的流動身分(各種身分)等問題，也都出現在此一短篇著作中。我們對於人們告訴我們關於他們的背景與家庭感到熟悉，但是霍爾

卻是不斷地反思他的個人歷史以及這個歷史如何造就他這個人。他並非直截了當地說明他的歷史，而是透過特殊的論述方式(且時常是關於他某些困苦現實的痛苦經驗)，來說明他的歷史。霍爾透過他自身的經驗來反思認同理論，並指出：「但是我現在的經驗正是後現代主義的論述所產製出的東西，並非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而是一種對於過去一直存在之身分認同的認識」(Hall, in Gray and McGuigan, 1993: 134)。霍爾在此正展現出一種對於雙重性的興趣。在透過一種理論闡述(後現代的認同理論)反思他汲取自經驗、汲取自他的生存方式(本體論)的知識時，他已經在生產知識了(知識論)。因此，他的經驗被認為是超越了他自身的個人觀點，並以歷史的面向，將他的經驗放進一個更為理論性、也因此更為廣義的(後)現代認同建構的普遍概念中。

威廉斯(Williams)也以相同的方式論及經驗的實用性：「倘若我們要確定：當一個新研究產生了一個突然的、認知上的震撼時，那些特殊且特定的時刻所發生之處，那麼，確認一個人經驗的本體面向是必要的」(Williams, 1979: 164)。

但是霍爾的認知告訴我們更多關於確認「經驗」的必要性。他從「邊緣」(margins)的經驗談起，他身為從牙買加移往英國的移民者經驗，賦予他某些先前未曾意識到的身分特徵；在成為一個移民者的過程裡，他第一次認識到身為黑人所代表的意義。他體驗到現代的移民經驗所時常提及的關鍵要素，即：零碎切割(fragmentation)與邊緣化(marginalisation)。後現代理論才剛意識到生活經驗之重要性的事實，正透露了西方理論學者的立場，以及忽視邊緣化的生活經驗所可能產生的後果(這些邊緣化的生活經驗很容易被貶值或忽略)。

因此，關注於生活、關注於個人如何看待他們的生命，以及關注於他們如何看待他們自己與他們經驗之間的關係，可以

產生新的知識以及威廉斯所說的「認知的震撼」(shock of recognition)。倘若文化研究仍持續保持在一種動態的研究領域, 並避免變成一門因襲不變的研究學門, 那麼, 對於上述議題的關注, 將是文化研究的根本所在。

在早期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裡, 經驗(尤其是邊緣團體的經驗, 例如: 青少年團體、年輕女人或女孩團體)一直被視為是真實而有價值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 在為研究尋找新的立論基礎、在研究中引薦新的但至今卻尚未被提及的聲音時, 彰顯那些經驗的陳述或表達之驅力, 才是至關重要的。然而, 正如普洛賓對於女性主義理論的建議所指出的:「(他們)要不是以經驗本身來證實經驗, 就是不假思索地反駁它的可能性」(Probyn, 1993: 5)。不假思索地反駁它的可能性, 是一種可行的方法。這僅僅是表示, 宣稱「真正的觀點」其所可能隱含的危險性實在太高了, 以致於「真正的觀點」做為任何知識的基礎, 都該被懷疑。在普洛賓重新評估威廉斯的作品後, 她發現:「經驗」是威廉斯作品的一個主要範疇, 而且對普洛賓而言, 也是一個極大的靈感源頭。她論及:「我希望將經驗視為一個關鍵的辭彙, 並勾勒出威廉斯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之間所建構的一種豐富的緊張關係」(Probyn, 1993: 18)。我同意普洛賓的看法, 因為對我們的研究而言, 經驗仍舊是一個豐富且成果豐碩的研究範疇, 而普洛賓也援引威廉斯的觀點, 並指出三種分析的可能性, 或是三種今後保留或動員「他人」經驗的方法, 同時也包括以社會與文化的分析, 來理解我們自己的經驗。然而, 重要且顯而易見的是: 威廉斯所致力於檢視的是他所謂的「無法解決的連續性的社會物質過程」之本質。這個過程是由政治、藝術、經濟與家庭組織所構成, 並作為構成整體的要素, 但是威廉斯所強調的重點在於: 這些元素之間彼此無法逃避地相互連結, 並構成生活經驗。很明顯的是, 威廉斯正試圖讓馬克思主義的

經濟決定模式與生產模式，成為主宰其他社會整體的主要模式。有趣的但也同時困擾著他的是，他採用他自己的經驗來催生他的理論。他的三個分析命題包括：

1. 經驗可以是壓倒性的，並且隱藏不同結構之間的關連性。
2. 經驗本身涵蓋了社會形式的組成。
3. 批判者本身的經驗可能驅使他或她去分析他們與不同層級的社會形構之間的關係(引自 Probyn, 1993)。

這三個命題的前兩個命題有助於思考：當我們試圖在我們的研究中處理他人的經驗時，我們如何分析性與批判性地運用經驗的方法。第三個命題則引薦了批判者、或研究者的經驗，而這些經驗不僅對我們的理論與分析工作相當有助益，更能應用於這些理論的分析工作之中。因此，身為研究者，我們自己對於日常生活與文化的經驗，不但不會造成我們研究的困擾，也不會動搖或讓我們的研究產生偏見，我們的這些經驗應該被承認並應用到我們的學術工作之中。

為了要瞭解經驗可能會在我們的研究中發揮什麼樣的功效，依序發展這三項命題或許將有很大的幫助：

1. 經驗可以是壓倒性的，並且隱藏不同結構之間的關連性。這個命題在於警告：經驗可能會而且很容易被當成一種常識與意識形態的貯存類目。就這方面而言，例如：經驗可能意味著一種獨特的、主動的人類主體性的存在，他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自由意志，並自由地進行選擇。這是一個在西方社會與文化中，高度被接受且通常是成功的個人意識形態，此種意識形態抹煞了結構的運作情形及其侷限。因此，威廉斯如此說道：

在某些特定的時期裡，經驗恰好處於最不受重視的情況，因為經驗被視為是阻擾了這個一致過程的實現，並隱蔽了不同結構之間的關連性。這並非意指那些未被注意到的組合與從屬關係，或是差異與不平等關係、剩餘與新興等關係，賦予這些不同結構之間的關連性特殊的本質(William, 1978: 138)。

2. 經驗本身涵蓋了社會形式的組成。換句話說，正如普洛賓所言，「雖然經驗所描述的是日常生活或『生活方式』，但是它也同時是分析那些構成真實之關係的關鍵所在」(William, 1993: 18)。如此一來，經驗即是透過語言而得以表達與構連的。我們如何看待我們自己，我們如何「訴說自己的故事」，或是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向他人提及我們所生活的地方。作為獨立的個體而言，我們並非是闡釋我們自己經驗的真正來源，反而僅是我們所處之特定社會、文化世界內的定位之中介者。因此，當我們從他人身上獲得一些觀點時，我們正被置於知識、地位、論述與符碼這個儲存類目的遊戲中，透過這個遊戲，「個人」可以構連或表達他們「自己的」經驗。威廉斯特別堅持為我們於日常生活中所經驗到的事物賦予價值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因為這生產出一種對於人類生活與社會的豐富理解，更是因為分析若是僅僅強調經濟與政治面向，反而會忽略了社會生活本身正是構成社會的主要要素。他主張：這即是他的經驗所告訴他的。「人與社會並非受制於權力、財產與生產之間的關係」(Williams, 1978: 138)。威廉斯回應當時的學術氛圍：當時公領域與男性領域備受矚目，但是私領域與家庭的私密世界卻被學術界排拒於邊緣領域內。

3. 批判者本身的經驗可能驅使他或她去分析他們與不同層級的社會形構之間的關係。身為研究者與學者而言，我們是我們所感興趣的世界中的一份子。簡言之，我們以社會生存者的身分經驗著世界，這樣的身分時常提供我們將世界予以「理論化」的起始點。在我開始攻讀更高的學位前，在我前往位於鎮上辦公室的公車上，我不斷地思忖：為何成千上萬的人，日復一日地踏上如此相似的規律旅程。這是一次相當貼近實證經驗的觀察，同時也為我想解釋社會以及解釋我的研究的學術好奇心標記下起始點。當我開始學習、閱讀並從事思考後，我開始轉向經濟理論、勞動理論、家庭與性別理論，希望藉此分析我自己的生活經驗，這些生活經驗即是威廉斯所謂的「無法解決的」社會經驗。對普洛賓而言，有一種危機存在著：「生活經驗」已經逐漸淪為學術著作中僅僅是「另一種咒文、另一種抽象的研究對象」。為了要賦予生活經驗真實意涵，批評家與學者必須要「在理論的領域裡」，注入他們自己的經驗才行 (1993: 21)。

威廉斯所論及的以及普洛賓所強調的，是一種將經驗予以概念化的方法，此種方法讓經驗去除它的浪漫真實起源，並將經驗放入一個豐富來源裡，成為可供學生與研究者從事生活文化研究的資源。他聲稱我們可以藉著意識到我們自己的主體性與經驗，以及承認他人的經驗不僅具有本體論的價值，更具有知識論價值等方法，來生產知識並獲得認識世界的方式。

在下文裡，我將討論使用經驗的不同方式，以及文化研究所面臨的問題。當經驗以如此的方式被使用，而且可能成為壓倒性概念而隱蔽了不同結構之間的關連性時，究竟會造成什麼後果？

壹、記錄「經驗」

早期的文化研究學者堅稱文化研究的民主化潛能性，而將不同的觀點帶入定義狹隘的知識領域內，因此，這些觀點都致力於探求「生活經驗」，並以知識與經驗本身作為探求的基礎。人們究竟是如何或者是以何種方式，在特定的環境背景下(尤其是那些受限於不利的社會與文化因素下的人們)思考、表達生活的經驗？如此的研究取徑可能是早期文化研究的精髓，尤其是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所特別關注的焦點。在此類的研究中，研究者希望研究與探索勞工階級青少年的「真實」世界，並提出如下的問題：究竟生活在如此的社會經濟環境下，是什麼樣的滋味？階級與不斷改變中的勞工階級生活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這一個世代？年輕人如何能夠理解他們自身的存在(其意義為何)？他們投注於他們的勞動與休閒世界有何意義？從這些行動者或主體的觀點出發來看待世界，是這些研究背後的主要驅動力。就方法論而言，為了要獲得對這些生活與社會世界的豐富且完整之觀點，他們採取了質性的研究技巧，主要是對這些相關行動者進行參與觀察與訪談。「如實訴說」(telling it like it is)並讓底層人士(英國與美國社會中的底層人士)得以發聲，這是此類研究取徑以及此種研究潮流的一致宣稱。

女性主義社會學與文化研究中相似的研究，也都致力於彰顯女性不僅被隔離在特定的家務生活之中，也在「女性職場」的圈套中被孤立(Gavron, 1968; Comer, 1984)。此類的研究工作探討了女性生活與經驗的不同面向，例如：她們與醫學專家的接觸、「家庭主婦」如何使用廣播與電視、女性的閒暇活動、勞工

階級女性如何獲得關於陰性特質的知識等等 (McRobbie, 1978; Hobson, 1981; Graham, 1984; Deem, 1986)。所有的這些研究都以經驗為基礎，也都使用了經驗資料，無論直接或間接，這些研究都依據女性經驗的表達來引出研究資料。關注女性經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她們的經驗被大部分的女性主義研究視為是一種政治性的操弄。所以，此一時期的女性主義研究可以被視為是由各種不同的干預主義研究計畫所組成，這類的研究計畫認為必須關注於女性的生活經驗，也必須如實地記錄女性的生活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學門領域之間，那些被描述為具有民主動機的研究者，她們的主要目標在於：記錄下那些「隱諱」的生活與世界，「訴說各種不同的故事」以及彰顯出不同的觀點。此種研究模式時常具有政治性意涵，這些研究中的許多參與者都是廣闊良好教育機會下的受益者，他們將他們自己的背景與經驗帶入他們的學術工作裡，而且也都致力於反對傳統學門典範的限制。

這些證據到目前為止都還相當重要，而且若能策略性地、政治性地運用，也都還相當有力。近期的一個例子則是亞歷山大 (Clare Alexander) 關於亞洲青少年男子的研究，在此研究中，她採用了他們對於自身生活與文化實踐的觀點，藉此反駁英國大眾報紙所呈現的「亞洲幫派」之刻板印象，這些報紙將他們視為是對都市與內城市穩定性的一大威脅 (Alexander, 2000)。除了社會與文化研究學者外，還有誰會以對他們有利的立場，從涉入的主體身上，一點一滴蒐集每一個重要時刻的資料？

然而，問題是如此的「記錄」或「實證」的研究模式，卻存在著諸多嚴重的侷限，而這些侷限早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突顯出來了。就部份而言，這些侷限可以回溯到此一研究事業的核心：即，「經驗」這個充滿疑問的範疇。歷史學家史考特 (Joan

Scott)在歷史編纂學中巧妙地討論了經驗的地位。在歷史編纂學裡,經驗是真實的來源,也是史考特所描述的「早已存在於那裡」的記述性證據(Scott, 1992)。因此,同樣地,在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裡,他們的研究目的也在於:將迄今尚未被彰顯的生活與未被認識的經驗予以凸顯出來,使其成為可見的(visible)事物。然而,史考特卻不認同於可見的(visibility)這個隱喻本身,因為這個隱喻暗示著可以對世界與通透而可知的客體進行直接而無需中介之理解的可能性。她認為,在歷史中,以此研究取徑為基礎所累積的更有力的證據觀點,不過是提供了一個放大的既存圖像而已。

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研究途徑更廣泛的可能後果是,讓主流的學術研究得以適用於此種研究主體。因為,雖然對於人們生活與經驗的豐富記錄擴大了他們的面貌,但是這些資料可能或多或少僅是未加質疑地「拴在」既存的研究工作上。於是,這些觀點變成了該研究領域的另一個研究面向,而非對該領域的理論與方法論假定提出激進的挑戰。有許多極為激進的問題必須要提出來,例如:為何這些觀點會被以隱晦的形式提出?既存的方法論如何將特定的認識方法劃分出階級?就史碧娃克(Spivak, 1987)而言,我們有可能可以藉著使用既存的、「合法的」理論取徑,讓「主體立場的配置得以顯現」嗎?對史碧娃克而言,這些理論與方法都應該被質疑,除非它們可以讓我們「瞭解複雜的操縱情形以及不斷改變中的論述與物質過程,藉由這些過程,認同可以被歸因、被拒絕或被接受,但是這些過程本身並未被注意到,甚至未能達成它們的功用,因為它們從未被注意過」(Spivak, 1987: 214)。

在威廉斯的第二個命題裡,他指出:「經驗涵蓋了社會形式」,如此的見解提供我們一個用來思考經驗的有效方法,同時也滿足了史碧娃克的某些研究需求。

貳、構連經驗

現在，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找到可以用來思考如何使他人的與我們自己的經驗，同那些社會組織結構產生聯繫的方法。同樣地，普洛賓的論述對我們相當有助益，她提及：「就本體論的層次而言，經驗涉及了介於構連的與生活的社會面向之間的斷裂；就知識論的層次而言，經驗催生了一種用來分析介於構連的與生活的社會面向之間關係的方法」(Probyn, 1993: 22)。比起那些認為對於特定團體的社會、文化生活之有限範圍，好像只能存在著一種主要解釋，而將經驗化約至「經濟」或「父權」等因素上的研究，普洛賓的想法需要更仔細咀嚼。這即是意味著直接將理論置在實證之上的本末倒置，或是粗暴地對待研究資料。也就是說，例如：我身為一個女性，是一個完全被我在父權社會中之位置所決定的角色，這注定是一個必須忽視諸多際遇、活動與實踐的角色，而在這些活動與實踐中，我的性別認同被強調也被忽視。舉例而言，在我所工作的大學裡，在我與主要是由男性所組成的委員會會議中，我可以感覺到我被當成是「一個女性」；但是在我教學時，與學生、同僚進行討論時(雖然我很明顯的還是一位女性)，我卻覺得我的性別不再那麼重要。在家庭、朋友、異性戀與同性戀關係中，性別政治各有所不同。

方法論的問題主要在於發現一種分析機制，此種分析機制可以捕捉到細微的生活經驗，以及經驗如何透過語言與行動或表演而表現出來。此種機制必須能夠認知到生活文化的動態過程，但卻不能忽視那些構成生活文化軌跡、生活選擇以及日常

生活俗事的主要力量。

構連是一種用來思考當代社會與文化複雜性，以及如何將這些複雜特性當成社會主體的有效方法。構連的概念是由拉克勞(Laclau)所發展出來的，再由霍爾詳盡發展至文化研究中；此一概念提供一種思考介於個人行動(主體性)與廣義的社會結構(決定性結構)之間複雜關係的反本質主義與反化約主義的方法。對霍爾而言，經驗在此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基礎，可以用來調和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論述(Hall, 1996)。

所以，「經驗」是處理「統合」要素之顯明形式的基礎，在其中，各種元素以某種方式被結合在一起。這個概念的價值在於：它避免採用一種決定性的、機械性的模式，在此種模式裡，強而有力的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形構了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甚至，此一概念讓我們得以探索主體與不同論述元素之間的關係，假使效用強大，還得以讓我們探索論述元素間的關係。在較為決定性的「個人」與「社會」模式裡，留予主動的人類主體極少空間，供其在特定的脈絡下運用發展，也很難透過此特定脈絡，建構出特定的主體性與認同之構連。這同時也確認了一件事，由於某種程度原因，主體並非存在於某個特定的脈絡裡，如同以往被動地接受事物，而是主動地生產他所處的脈絡。在此，我們有諸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我們的研究中，將經驗的角色予以概念化，並構連所謂的經驗。

許多早期發展中的文化研究都援引了主體的概念，並假定階級與性別等社會「歸屬」範疇是「主要的」主體位置。構連的概念開啟了理解後現代社會與後現代經驗之流動的可能性，從重新連結起主體/結構之間關係而衍生出的概念，即是所謂的「認同」概念。

參、認同的問題

一九九二年於伊利諾大學所舉辦的「文化研究的現在與未來」(Cultural Studies Now and in the Future)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已集結出版,書名即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Grossberg et al., 1992)。麥克羅比指出:「認同」的主題貫穿了整本書。同樣地,在另一本選集裡,葛洛義(Paul Gilroy)也寫到:「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體會到,我與英國文化研究接觸的創辦性文本幾乎都聚焦在認同的主題上」(Curran et al., 1996: 44)。

但是麥克羅比所問及的「認同」,究竟意味著什麼?霍爾指出,我們並非將認同理解成一條用來瞭解我們自身存在之基本核心的線索,相反地,經驗才是「主要的處理基礎:才是『統合』各種要素的顯明形式,在其中各種元素以某種方式被結合在一起」。霍爾認為,主體與「論述形構」相關,亦即主體是透過構連的構成而形成的。所以,主體居住在不同、多樣、且與論述相關的位置上,而獲得不同的建構中的論述,這些論述建構為他或她建構出她或他自己的認同。

麥克羅比在文化研究中回應了認同概念的重要性:

認同可以被視為將文化研究拉進一九九〇年代的主要概念,它扮演一種指導角色,引領人們如何看待他們自己的方法。認同並非以階級主體、也非以精神分析主體或是意識形態主體、或是文本主體來理解人類主體,而是將人們當成行動的主體,此種行動主體對於自我的觀感會投射到廣泛範圍的文化實踐上,同時也是在文化實踐中表達對自

我的觀感，這些文化實踐包括有文本、影像以及商品等
(McRobbie, 1992: 730)

麥克羅比又進一步觀察到：雖然在文化研究裡，對於認同概念在理論上日益精緻的發展，已有所討論與描述，但是卻鮮少出現真正的民族誌研究，或真正處理關於社會文化認同的研究。亦即，鮮少有反思性地探討認同建構的研究出現。究竟我們是如何建構我們的自我意義以及我們的認同？我們所採用的論述是屬於哪些種類，是音樂、時尚或是語言？而這些表達的形式又是什麼，例如風格、體現以及我們訴說我們自己與他人的敘事？

威廉斯所提出的最後一個命題，要求我們必須在我們的研究中，對我們自己的立場進行反思。

肆、我們從何處發聲？

對我而言，經驗的概念與哈樂葳(Donna Haraway)所描述的知識論觀點或從特定優勢觀點發聲的概念相關。這意味著：我們無法不帶任何觀點地進行發言，相反地，我們的發言都與我們的立場有關，無論是社會立場、文化或政治性立場。哈樂葳是諸多女性主義學者中，堅稱必須承認此一事實的學者之一(Harding, 1986, 1987; Haraway, 1990)。他們認為，有太多的理論學者與知識分子都傾向於不帶任何立場地發言，傾向於將自己的身分視為脫離現實的仲裁者，仲裁真理與知識。從女性主義的觀點而言，這生產的不僅是陽性主義(偏頗的說法)的(masculinist)理論與知識，甚至低估且貶抑了可能來自於某一特

定、特殊生活經驗的知識價值。對史丹利(Liz Stanley)而言,這同時也是一種「否認」責任的方法,是一種不信任你用以生產知識之方式的方法(Stanley, 1990)。最後,我們有可能會無視於真實的單調平庸性,而採取一種偽客觀的學術立場,毫無質地擁抱「真實」而不對其真實性有所懷疑。

哈樂葳宣稱:我們的本體論立場(亦即,我們對於存有的經驗)可能會獨尊某些特定的知識種類。霍爾「知道」被邊緣化為一個移民者以及身為「黑人」意味著什麼,因此哈樂葳可能會宣稱:如此的經驗形成他對權力與歧視過程的獨特見解,舉例來說,而這些見識可能是「白種」英國居民所沒有的。讓我們翻轉上述的立場並堅稱:白種居民知識份子總是能夠承認,他們在他們的學術工作中所抱持的立場,因此,社會立場究竟如何透過他們的理論來發聲呢?難道他們真的完全承認他們有自己的發聲立場嗎?或者僅僅只是,如戴爾(Dyer)關於「白人」(whiteness)(Dyer, 1997)的主張所指出的:一種缺席的立場或許會被知識份子當成一種顯著且自然的立場。

人們對於立場不明確(或無法明確)的知識份子的批判與挑戰,可能是在於堅稱:經驗是構成個人自我的根本要素,以及經驗是如何主導某一研究議題與實踐的問題方向。女性主義學者一再聲稱經驗的重要性,這或許一點也不教人感到意外,而且他們也首次在他們的研究中透露他們的立場,同時也廣泛地政治化他們的學術實踐。舉例而言,哲學家哈定(Sandra Harding)就是諸多女性主義中,特別關注於方法論在女性主義社會科學裡之重要性的學者之一。她將女性的經驗視為論述的起點,並主張:「一旦我們允諾要將女性的經驗當成產生科學問題、假說與證據的一個主要來源,並依此設計出專為女性設計的研究,並將研究者放在與研究主體相同的批判層級時,我們就再也做不出傳統的知識論假定」(Harding, 1987: 181)。

所以,就這種情況而言,這為社會科學創造出一種女性主義議題,此種女性主義議題問及:誰是所謂的「知者」以及什麼是可以被認識的事物、什麼被認為是「合法的」知識?客觀性的本質是什麼?研究者與她/他的研究對象之間,應該保持如何的適當關係?追求知識的目的究竟是什麼?(Harding, 1987: 181)。也就是說:「誰可以認識關於誰的知識?又可以藉由什麼方法來認識?基於什麼樣的目的?」因此,思考「經驗」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經驗被給予的地位為何,所採取的詮釋模式又是什麼,這都是必然且必須思考的問題。

伍、透過構連來學習

在使用經驗這個範疇時所遭遇的困難不僅極為顯著,也相當龐大。然而,就我的觀點而言,正是「經驗」的這份頑強,才能成為其保留力的最佳論點。就某方面而言,這又回到經驗具有「令人感到震懾」的潛能上,但這並非意味著經驗是真實事件天真無邪的表現,也不是某些被理解為能動主體所在之個人所表達的知識。相反地,經驗是個人直接參與或觀察之事件的再現與表現;也在特定的環境場景裡,積累關於世界的知識;經驗也是關於人們生活在這些環境底下是什麼樣子,以及人們在其中所產生的個人感覺與情感。因此,這意味著:接下來我們必須先將「經驗」理解為一個尚未統一的範疇,這個範疇在各方面可能是流動的,可能基於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知識論結果。這些多變的範疇以及不同方法所產生的「資料」,可能極具挑戰性、不易使用而且也可能難以應付,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有所承認:經驗的本質與地位為何、依據分析與詮釋,從經

驗這個來源抽取出的會是什麼，以及經驗與方法論以及任何研究所採取的方法之間，具有何種關連性。

在上一章節裡指出，藉著在我們的研究中引薦入不同的觀點以及生存於這個世界中的各種不同方法，可使我們那些更為抽象的理論接受挑戰與質疑。這使得出席於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成為必要，但是針對經驗、主體性與認同之本質與地位，則需要更為精細的理解。

因此，研究總是結合了理論化的過程以及為研究主題尋找最合適且最豐富之研究方法的過程。本章所出現的關鍵性理論辭彙，即是：經驗、主體性與認同，這些關鍵性辭彙可以被理解成是透過「生活文化」所構連而成的。在下一章節裡，我們將探討這些元素是如何被運用在文化研究這個重要面向的發展時期裡。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